



主笔 王晓莹

倒在以军枪口下的记者

本轮巴以冲突以来,已有至少242名巴媒体人遇害

8月10日,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加沙城希法医院附近的一处帐篷,导致包括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阿纳斯·谢里夫在内的5名巴勒斯坦记者死亡。在以军口中,谢里夫“伪装成半岛电视台记者”,还被指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谢里夫遇害后,其家属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出谢里夫的遗言:“这是我的遗嘱,也是我最后的留言。如果这些话传到你耳中,那就说明以色列已经成功杀了我,并让我噤声。”

主笔 王晓莹

曾收到以军的死亡威胁

在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中,8月10日那场袭击的现场非常血腥,部分遇难者的遗体甚至还在着火,目击者中有人情绪彻底崩溃。巴勒斯坦防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以军袭击时直接瞄准记者们在希法医院墙边搭设的帐篷,有人“被炸成了碎片”。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经常指责驻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记者是哈马斯成员,意在诋毁这些记者对以色列暴行的报道。以军10日宣称,在加沙城打击了“伪装成半岛电视台记者”的阿纳斯·谢里夫。以方表示,根据“此前解密的情报信息”,谢里夫曾担任哈马斯一个行动小组的负责人,负责策划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的袭击。

谢里夫或许早就预感到了死亡,他曾谈及在报道加沙冲突时遭到过以军的死亡威胁。上个月,他在社交媒体上说:“我重申,我,阿纳斯·谢里夫,是一名记者,没有任何政治派别。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报道事实,实事求是,不带偏见。在致命的饥荒肆虐加沙时,在占领者眼中,说出真相已经成为一种威胁。”

联合国方面11日发声谴责以军空袭加沙城致巴勒斯坦记者死亡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这一最新悲剧凸显了媒体记者在报道加沙冲突时所面临的极端风险。他呼吁对事件开展独立且公正的调查,重申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以色列此举“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呼吁应让所有记者立即、安全、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地带。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蓄意针对记者的行为,表明其“罪行已超出想象”。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统计,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至少24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加沙地带遇害。

其父在以军空袭中身亡

谢里夫年仅28岁,他出生在加沙地带的杰巴利耶难民营,从阿克萨大学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谢里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以军空袭杰巴利耶的视频成了热点,并引起半岛电视台的注意,谢里夫从2023年12月起为半岛电视台工作。



起初,身为摄影记者的谢里夫不愿出境,“我连本地频道都没上过,更别提面向全世界了”。但后来同事说服他出现在镜头中,“当时最开心的人是我的父亲”。不幸的是,谢里夫在半岛电视台出境后没多久,他的父亲就在以军对杰巴利耶的一次空袭中遇难。

谢里夫几乎每天都出境,记录加沙地带北部的战况。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却经常因工作需要不能回家,“我们这些记者睡在医院里、街道上、汽车中、救护车里、仓库里,在收容所与流离失所的人住在一起。我大概在三四十个不同的地方睡过觉。”今年1月的一则视频中,谢里夫说当时8个月大的儿子只见过他一次,“又一次,我母亲带他来医院,他完全不认识我,他管别人叫‘爸爸’……他根本不认识我。”他问年龄更大的女儿:“你想在哪里工作?”女儿奶声奶气地答道:“像爸爸一样,做报道,当记者。”谢里夫在视频中说:“现在,我不指望能活下来,他们(以色列)可能还在追杀我。”说到这里,他反而爽朗地笑了起来。

在战火中报道,谢里夫“全副武装”,戴头盔、穿防护装备。今年1月加沙地带临时停火协议达成后,谢里夫摘下头盔,向那些在以军空袭中遇难的同事致敬,“我要摘掉这个沉重的头盔,这些防护设施似乎已经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庆祝停火的人群把他扛上肩头庆祝,还有人接过他脱掉的防弹背心。

“我们会坚守在这儿”

谢里夫是在巴以冲突前线报道的知名记者之一,尽管多次受到来自以军的死亡威胁,但他一直拒绝撤离,在

极度危险和基本物资长期短缺的情况下坚持工作。

谢里夫说,以军警告过他,要求其不要再为半岛电视台工作。“(以军)在WhatsApp上给我发语音信息……一名情报官员警告:‘限你几分钟内撤离当前位置,前往(加沙地带)南部,停止为半岛电视台报道’……我当时正在一家医院里直播。”几分钟后,他进行报道的房间就被炮弹击中。

7月21日,谢里夫报道了加沙地带遭遇饥荒的惨状,“每月底我们可能会收到薪水,但在加沙,有钱也买不到食物。所以,那些没有工作、流离失所的人,那些遭遇轰炸、成为袭击目标的人,那些住在帐篷里、居无定所的人,他们能去哪儿获得食物呢?”就在他说话间,一名女性晕倒在镜头前,“她是饿晕的……他们正在慢慢死亡。”

在“今日俄罗斯”发布的一则视频中,谢里夫问女儿:“(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把咱们赶出加沙,你想离开加沙吗?”女儿答道:“不,我想留在这儿。”“你想留在这儿,为什么?”女儿说:“因为我爱加沙。”谢里夫随后问女儿,去卡塔尔、约旦、土耳其吗?女儿摇头,坚持说要留下。最后父女俩对着镜头约定:“我们不会离开,我们会坚守在这儿。”

遇难前不久,谢里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加沙的夜晚被炸弹爆炸时的火光照亮,爆炸声不绝于耳。“无情的轰炸。”他写道,“两个小时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城的侵略愈演愈烈。”

谢里夫在遗言中说:“我嘱咐你们,不要被枷锁噤声,也不要被国界束缚,要成为解放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桥梁,直到尊严和自由的太阳重新照耀我们被占领的家园。”

法国总统马克龙定于9月向一位名叫阿里·阿克巴尔的老人授予国家功绩勋章,以表彰他对法国文化领域的贡献。现年72岁的阿克巴尔是一名卖报人,在巴黎卖了50多年报纸,可能是法国乃至欧洲最后一名街头卖报人。

阿克巴尔出生在巴基斯坦北部城市拉瓦尔品第,上世纪60年代晚期来到欧洲,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谋生,后来在去巴黎的途中遇到一位街头报贩,自此与报纸结缘。1973年,阿克巴尔开始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叫卖报纸。

起初,阿克巴尔结识了一名《查理周刊》的记者,于是向巴黎索邦大学和附近院校的学生兜售这本讽刺漫画杂志,凭借幽默的话语和叫卖吸引客户。上世纪70年代,巴黎街头活跃着三四十名像阿克巴尔这样的卖报人。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他们就像城市中的“大喇叭”,高喊着当天的头条新闻,为市民传递资讯。阿克巴尔说,那时候《世界报》上市一小时就能卖出八九十份。

阿克巴尔的老主顾里有一位买了22年报纸的画廊老板,他眼中的阿克巴尔“忠诚、善良且笑容满面”,而且“他还会在街头展示一种诗意”。所谓“诗意”,说的是阿克巴尔独特的卖报方式:“我会讲笑话,营造一种氛围……我努力走进人们的内心,而不是他们的钱包。”

阿克巴尔见证了报纸行业的变迁。他说,现在经常8小时只能卖出去20份《世界报》,因为“现在全是电子化的(产品),人们都在刷手机”。每天卖报收入的一半归阿克巴尔,但当天没卖完的报纸无法退回,每天大概能赚60欧元。

“我就是喜欢纸的感觉。”阿克巴尔说,“我不喜欢平板电脑之类的东西,但我喜欢阅读,读什么都行,只要是真正的书,而不是在那些屏幕上的文字。”在他看来,以文艺气息著称的巴黎塞纳尔左岸地区,如今也不复往日景象,高端时尚精品店和餐厅取代了书店,“以前这里到处是作家、出版商,还有演员和音乐家……现在不过是个旅游景点”。

如今,阿克巴尔自己也成了当地社区的一个文化符号。一名上世纪60年代迁居此地的居民说,自己好像和阿克巴尔“一起长大”,“他就像个兄长”。玛丽-劳尔·卡里尔是阿克巴尔的老主顾,她说:“阿里(·阿克巴尔)就是一个地标,我每天都从他这儿买一份《世界报》,我们还会一起喝杯咖啡,有时一起吃饭。”就连马克龙也买过阿克巴尔的报纸,“他以前在巴黎政治学院上学时,有时还会给我买一杯咖啡。现在他是总统了,我就很难见到他了。”阿克巴尔说。

法国的国家功绩勋章一般授予那些在军队或日常生活中“杰出服务”超过10年的人,阿克巴尔得到这一殊荣实至名归。他现在靠最低养老金生活,卖报已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享受其中的乐趣。阿克巴尔每天奔走卖报,相当于步行8英里(约合12.87公里),但他说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就会一直卖下去,“我喜欢走路,喜欢跟人聊天,在这里我很自由”。



获得国家功绩勋章的街头卖报人

法国老人阿里·阿克巴尔: